

科学地分析80年代的中国青年问题

——对《对〈青年问题的制度背景〉一文的剖析与批评》的反批评

邵道生

《高校理论战线》1992年第1期发表了宋秦年和肖思的《对〈青年问题的制度背景〉一文的剖析与批评》(以下简称《剖析与批评》)的文章,针对《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5期陆建华的《青年问题的制度背景——80年代中国青年问题研究之一》(以下简称《背景》)一文,提出了发人省思的批评。

显然,这两篇文章的观点、思路是完全不同的,因而其得出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如何科学地去考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青年问题呢?笔者愿就自己对中国青年问题的研究提出对《剖析与批评》一文的反批评。

怎样研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青年问题?尤其是如何分析处于大改革、大开放的80年代中国青年问题的起源、发展、社会后果等问题?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非常清楚,能不能对这个意义重大的课题作出科学的回答,首先在于作者的立脚点。

《剖析与批评》一文对这一问题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它认为:“在我国现阶段,虽然旧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着阶级斗争,有时还很激烈,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种国内外阶级斗争集中表现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并始终围绕着政权问题展开。”而且它认为,只有“全面地认清中国社会的这一个“历史背景和现实的经济、政治背景”,才能对“80年代的中国青年问题和社会上存在的其他一切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否则就会“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剖析与批评》一文的这一段人们非常熟悉的词句实际上是告诉人们这样一个观点:任何一个想认真地探讨中国问题的人,只能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和立场去观察、分析社会中的“一切问题”,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注意到“产生意识变化的物质变化和社会变化”,才能真正注意到“个人的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

笔者以为,《剖析与批评》一文的这一立论是不正确的。

第一,它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复杂的中国社会过于简单化了,简单到了认为只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可以认识到中国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了。在这一点上,我想应该对《背景》一文采取赞赏的态度,因为它是站在“80年代史称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开放时期,宏观的社会管理、控制和运行机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样一个复杂的背景中去探讨中国

的青年问题。

第二，只要你不是站在书屋子里为做文章而做文章，只要你稍微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去调查研究，你就可以发现，采用《剖析与批评》一文的这种绝对化了的“政治思维方式”，是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青年问题”的，更不可能解决“社会上存在的其他一切问题”。为什么？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并不是中国的所有青年问题都与阶级斗争有关，并不是都与“资本主义复辟”有关，并不都是与“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有关，并不都是始终“围绕着政权问题展开”的。**不仅仅青年问题是这样，其它的社会问题更是如此。然而，《剖析与批评》却偏要人们接受他的这种绝对化了的政治思维的方式，这不正是犯了他自己所说的“有意无意地抛开”“复杂的社会背景”的错误了吗？在这一个问题上，《背景》一文的作者正是抛出了这种绝对化了的政治思维方式去剖析现实的中国的青年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想，这种思维方式倒是应该提倡的。

第三，关键是《剖析与批评》一文所提出的这种观点能不能解决中国的青年问题。不管是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不管是“剖析或批评”他人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或观点，其最终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解决问题”？难道不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青年问题”吗？但是，当你耐心地将《剖析与批评》一文从头看到最后，你就会大失所望，《剖析与批评》一文对“中国青年问题的解决”并没有提出什么“有益的良策”。倒是《背景》一文的作者，在其对“典型的制度问题”、“隐性制度问题”、“反制度性问题”的分析中，给了人们不少有益的启示。

总之，正是由于《剖析与批评》一文的作者试图用过去的那种僵化的绝对化、政治化了的政治思维方式去观察社会问题，去分析“处于大改革、大开放的中国青年问题”，结果不仅使这种批判文章“苍白无力”、“乏而无味”，而且使自己陷入了“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困境”。

二

如何分析中国青年问题的社会制度背景？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社会制度？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定义社会制度是“人类社会活动的规范体系。它是由一组相关的社会规范构成的，也是相对持久的社会关系的定型化。”^①

辞海定义制度是：①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程；②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体系。^②

《背景》一文对制度的定义：“这里所说的制度，不是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统一层次上的社会形态类型，而是指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特定的准则、规范、机构和组织及其运行的体系，也叫体制。这种体系的实质是关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规定和制约，它通过一系列准则、机构活动来实施其社会管理、制约的功能。”

从《背景》一文对制度所下的定义来看，尽管在其表达上不是那么地简洁，例如，它将社会制度的构成因素（如观念、规范、组织等）也加入了定义之中，但是，可以肯定地说，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52页。

②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423页。

它并没有犯下原则的错误,或者说并没犯下《剖析与批评》一文所指责的缺乏“社会学基本常识”的错误。因此,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可以做文章的。

但是,《剖析与批评》一文居然能在不值得做文章的问题上做起“大文章”来了。请看文中的以下一段文字:“只要是懂得一点社会学常识的人就可以知道,一般来说,社会制度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社会根本制度,如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第二个层次是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等等;第三个层次则指具体的规章制度,如学习制度、安全制度、交通制度等等。不管作者如何声明他所讲的制度并不是政治、经济制度或社会根本制度,但“制度”二字无论如何也不是随随便便能用的,作者也是煞费了一番苦心才大胆地使用了这个名词的。”

在什么是社会制度上,《剖析与批评》一文对《背景》一文作了如此近乎于荒唐的批判,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其一,《背景》一文是在用自己的概念去努力回答“什么是社会制度”,然而口口声声要“廓清”“制度的含义”的《剖析与批评》一文,却拒绝对社会制度作出任何自己的定义,而是用最常识性的“制度的三个层次:社会根本制度、不同领域里的制度和具体的制度”去批判《背景》一文中的“对什么是社会制度的定义”。这样一看,正是《剖析与批评》一文“在概念中兜圈子”,玩“概念的游戏”,并有悖于社会学的基本常识。

其二,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或者是在社会科学对问题的研究探讨中,“社会制度”或“制度”这两个概念是我们经常应用的。但是,《剖析与批评》一文却硬说:“‘制度’二字无论如何也不是随随便便能用的”。我不知道是谁赋予《剖析与批评》一文的作者有这么大的权利,居然还有不许他人应用“制度”这一概念的权利;我也有点“纳闷”,为什么《剖析与批评》一文作者的学风如此霸道;只要是与自己对制度的见解不同,就硬将他人说成是在“随随便便地”“使用”。我只知道,即使对属于“第二层次”的“比较敏感”的政治、经济制度等等,中央也在号召社会科学家们的积极地去探讨和研究如何改革现行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的弊端,以便更好地去完善“第一层次”上的社会主义制度。

其三,既然我们要对“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那么,一个最简单的常识是:必须要对“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中的某些不合理性进行“怀疑和挑战”,如果我们连一点点“怀疑和挑战”的勇气都没有,认为它的一切都是完美无缺的,那么,我们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又怎么能进行得了?社会怎么能发展得了?因此,在深化改革之际,我们对社会中出现的一切问题(包括中国青年问题)应该有这样“怀疑”的习惯: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其中,与我们现行制度中的弊端有什么关系?不要一提出“怀疑”和“挑战”,就视作为洪水猛兽,就视作为是一种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出现。如此“神经过敏”,无益于我们改革事业的发展。我在反复地、比较认真地读了《背景》一文后感到:这篇文章的确属学术研究的范畴,文章及其作者本人都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我倒是感到有点遗憾:《剖析与批评》一文的“火药味”太重了,随随便便地对《背景》一文“判处政治上的死刑”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

三

如何认识中国的青年问题?它与社会制度究竟有什么关系?如何通过解决制度中的

去解决中国的青年问题？

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有两种方法和途径。一种是在自己对中国青年问题长期研究，并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另一种则是按照现成的结论，将新的变化了的条件下所产生的新的社会现象塞进已有框架之中进行认识。显然，认识问题的不同方法必然会对上述问题作出截然不同的回答。

例如，从中国青年问题产生的原因来看，《背景》一文提出了主客观方面的诸种因素，同时对廓除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统一层次上的社会形态之外的普遍的特定的准则、规范、机构和组织及其运行体系的“制度”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已有的制度没有为青年健康地实现个性、实现创造力的发挥、实现成功目标提供合理的机遇和途径。”然而，《剖析与批评》一文对此作了这样的批判：“新中国的成立，迅速地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使广大劳动人民获得了政治上平等自由的权利的主人翁的地位……。广大青年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下，感到了极大的幸福和骄傲。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为青年开辟了最广阔的前途，保障了他们能够全面地健康地发展。”

在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上，《剖析与批评》一文至少有这些问题：一是它低估了现阶段中国青年问题的严重性；二是它将完美的、理想化了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人的个性发展作用代替了社会的现实；三是将他人论述与中国青年问题相联系的制度上的弊端与政治上的制度比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混淆起来了。

多年以来，笔者一直在从事中国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研究，而且始终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会产生这样严重的中国青少年犯罪问题？它与我们的“制度”究竟有什么关系？在最初的时候，我还是单纯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释中国青少年犯罪问题，恪守社会主义制度与犯罪毫无关系的信条，然而当我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后，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是，由于生产力没有得到更好的发展，社会运行机制不完善，我们现实社会中的制度并没有使青少年都“全面地健康发展”，相反地，我们的升学制度和就业制度上的问题，使中国社会产生了相当数量的“低层次青少年层”。我的研究表明，低层次青少年层有以下四个特征：①文化水平低；②道德水准差；③社会化发展有缺陷；④对社会的发展缺乏适应能力。大量的事实表明，差不多当代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都与这“低层次青少年层”相联系着；待业、流失、乞讨、吸毒、卖淫、童工、童婚等，其中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青少年犯罪问题。从70年代末期到现在，青少年犯罪问题占社会犯罪始终在70%左右。毫无疑问，在观察这类问题时，阶级斗争的观念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然而却不能穷尽其全部，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因素是与我们许多的具体的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最为简单的推理是：既然社会不能满足于青少年发展的最基本的需要，那么，他们当然要以自己“发展中所产生的问题”来反作用于这个社会。这就是社会学家对“社会的反动”这一概念的理解。显然，与政思想家所理解的那种为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那种有目的、有计划的“政治反动”是不相同的。如果我们是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背景》一文中所出现的诸如“反制度性问题”、“偏制度的社会行为”、“反叛性的政治行为”等概念，那么，我们也就不会“大惊失色”

其实，即使对于正常的青年人来说，对于因一些具体制度上的弊端而使自己的聪明才智到健康的发展而引起的不满，是相当普遍存在的，这的确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问题。一个对青年实施的比较大范围的社会调查，当要求青年回答“您目前最大的苦恼是什么”

的问题时，青年们对8种回答选择结果的顺序是：不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收入低、精力无处释放、住房紧张、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找不到理想爱情、孤独和不被人理解、个人才能不足。从中可以明确看到：第一位的因素是不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当然，对这一结果，《剖析与批评》一文已经作了它的解释：这一问题的产生是由于青年本身的认识偏差，甚至还引用了毛泽东同志以下这段话来批判这种青年人的“错误的认识观”：“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力气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当我最初看到《剖析与批评》一文对这种现象作这样的批判性的解释时，我就有一种“‘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感受，但是，当我想到《剖析与批评》一文的作者也是“秀才”时，我就有点怀疑我的思维了：难道这些秀才果真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为什么他们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是如此地不了解？！离我们的真实的现实是那样地远？！

我想，只要是对我们的社会负责，只要你还是一个有良心的科学家，那么你就不能不同意《背景》一文对80年代中国青年问题特征的归纳：“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改革促使青年问题以空前形式爆发出来”，“数十年间（而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笔者注）形成的旧有制度及其弊端使青年问题积重难返”。

当然，中国青年问题的形成、特征及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因为《背景》一文的题目是《青年问题的制度背景——80年代中国青年问题研究之一》，因此，笔者只能是“扣题而写”，其余问题（如青年问题的国外影响的背景等）则可以留待在80年代中国青年问题研究之二、之三、之四中阐述。我想，《剖析与批评》一文的作者是应该懂得做文章的基本方法的。

四

《剖析与批评》一文的确是一篇“火辣辣”的大批判文章，其中给《背景》一文扣的帽子是否定10年改革。

鉴于10年改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鉴于改革是这样如此深入人心，因此，当今中国只要谁否定改革，就必然要受到全党共讨之，全国人民共伐之。罪名的确是够严重的。

关键是《背景》一文是不是在否定改革？这顶帽子扣给《背景》一文是不是合适？

笔者以为，《背景》一文并没有在否定改革，《背景》通篇反映的思想是：中国的社会需要改革，要深化改革，而且要结合中国青年问题所反映的社会背景进行改革。否定改革是《剖析与批评》一文强加于《背景》一文的。是天大的“冤枉”。

请看《背景》一文是如何描述改革成果的：

“80年代史称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开放时期，宏观的社会管理、控制和运行机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以经济制度改革为核心，牵动了一系列社会制度的连续不断的改革。在这10年中，每一项改革措施乃至方案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后果，包括社会生活的变化、社会成员的观念与行为的变化，由此构成了进一步改革前提下，激发了新的改革愿望。改革的浪头就是这样不断地涌动、前进，改革由局部而向全局、由表层而向深入。”

限于篇幅，笔者不想穷尽《背景》一文对改革的赞扬。但是，即使从上述作者对改革赞扬的词句中，就可以看到《背景》一文的对改革的“积极的革命的态度”，无论如何得不出《剖析与批评》一文对《背景》一文所指责的结论：对“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将改革中的中国社会“描写得似乎很黑暗”。

那么，为什么《剖析与批评》一文会得出一般人得不出的结论呢？因为它不习惯于在改革中发现问题（似乎一提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就要否定改革似地），尤其是它不能够发现也不太愿意结合中国青年问题所反映的社会背景去进行改革。而这的确是深化改革、加快改革步伐之必须，也的确是《背景》一文的“高明”之处。

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我们的社会改革是处于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被历史“逼”出来的，是邓小平同志抓住了最宝贵的时机，将改革变成为社会的现实。因为缺乏理论的准备，又无“前车之鉴”，可怕的“文化大革命”给后人留下的又是一个濒临崩溃的经济基础，再加上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大国的种种复杂的因素，因而我们的改革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在这种情况下，某些改革步骤考虑不周，某些改革措施的失误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说《背景》一文有什么缺陷的话，这方面的论述是少了一点。

但是，改革中的某些考虑不周或者改革失误的“不可避免”，不等于要这些不合理因素长期合法的存在下去。要使社会发展得更快，要使改革深化，就必须要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改革，这才是一个真正改革者的态度和立场。

《背景》一文正是站在这一立场上去努力探索完善80年代的改革。

改革，从其实质上来说，是在发展生产力基础上对各个阶层利益的重新调整。应该说，与改革以前相比，青少年群体的利益是有所发展的，但是，与其他阶层及社会群体（如与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干部和个体户等）相比，其利益状况的改善相对缓慢，有的方面甚至可以说是处于被忽视的地位。正如《背景》一文所指出的那样：一方面，“从基本价值准则来看，整个社会并没有把青年问题看成是完整的、独立的、意义重大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青年被当作一个完整的、独立的教育对象（特别是思想教育），着力于从教育立场来解决青年面临的大量的制度性难题。”《背景》一文的作者继续说：“这种尖锐的矛盾便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在80年代，青年问题的解决得不到必要的制度保证，也缺乏起码的制度步骤。这对10年期间青年问题的演变、特点和未来趋势产生了巨大的消极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青年问题的严重程度。”

应该说，《背景》一文对中国青年问题的分析还是比较中肯的，基本上反映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的现实。

当然，《背景》一文并没有充分论述为什么整个社会对青年问题“主要着眼于教育，而没有着力于对青少年发展的物质投入”，这也许是《背景》一文的另一个“缺陷”。笔者倒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不是作为社会的执政者不想对青少年的发展进行大量的“物质投入”，而的确是因为“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每一项对青少年发展的“物质投入”都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如升学需要兴建大量的学校），都是以生产力飞速发展作为其后盾（如就业需要兴建大量的工厂）。然而，国民经济发展低下及社会资源有限配置的现实，一时难以顾全于此。整个社会处于“两难”的境地：想投入而投入有限。80年代中国青年问题的发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这也就是《背景》一文所说的“缺乏起码的制度步骤”。

总之，《背景》一文从根本上来说是无意否定我们的改革，倒是在肯定的基础上，从维护、促进改革的立场出发，清醒地指出我们改革中的缺陷，提醒我们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在加速改革步伐时，对青年问题的解决必须要从制度上给予保证，采取必要的制度步骤，使制度改革目标、措施和实际后果有机地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在90年代解决80年代

遗留下来的中国青年问题。

笔者认为，对改革的这种态度才是严肃的、负责任的。遗憾的是《剖析与批评》一文却以一种漫不经心的笔调来叙述10年改革中的问题。请看：有关中国青年问题，“有的是‘文革’造成的后遗症，有的是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其中有的问题已经解决，有的正在解决之。”还说：“任何一个社会，没有问题、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包括制度上的不完善和工作中存在的某些严重失误。”如此轻描淡写是正视了80年代的中国青年问题吗？这样一笔带过就能解决得了中国青年问题吗？难道这种不痛不痒、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态度就算是对改革持“积极的革命态度”？！

五

80年代的中国“大学校园内的政治动荡”的确引起了世人的重视。但是，当人们将思维引向为什么“大学校园内的政治动荡”那么多时，《剖析与批评》一文却作了最简单的归因：“资产阶级自由化从哲学、文学艺术发展到政治思想，从思想理论观点发展到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再加上‘美国之音’等西方传播媒介的造谣煽动，这才是大学校园政治动荡的根源。”

其实“大学校园的政治动荡”的原因并没有那么简单。

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政治信仰、信心的低落及信任危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的确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发展起来的一代人所受到的“时代的愚弄”，以及后来所经历的“发展中的挫折所造成的心灵创伤”，也是这种低落的重要原因。然而，我们的思想工作却在治愈青年一代“政治上的心灵创伤方面”却是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

而且，还应该注意的：在我们党内对社会风气、党风方面存在的问题的评价越来越“升级”（从“不正之风”→“严重不正之风”→“腐败行为”）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却在逐渐地失去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五十年代的那种极其宝贵的人格力量，因而使思想政治工作的效能被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

而且，正如我们党自己也承认的那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有些单位，思想政治教育甚至被置于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步。

总之，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是被大大地削弱了，而在另一方面，社会的执政者们又试图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解决中国青年问题，试图用思想政治教育去解决停留在人们（青年学生）思想中的许多难题。而且，诚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它应该有的“物质基础”之间又处于“脱节”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出现《背景》一文所指出的那种现象：“在对待青年（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政治不满和政治偏离倾向方面，没有采取积极方针，而实施诸如堵、压之类的消极手段，这样激化了青年的激情抑郁，导致社会政治关系的高度紧张。”因此，《背景》一文认为：“传统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改革需要深化。”

作为对青年（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失灵”的反思，《背景》一文所提出的批评性意见的确是“忠言逆耳”。然而《剖析与批评》一文却认为是“大逆不道”，不仅对《背景》一文进行了“文不对题”式的批评，而且还作了无益于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很不妥当的政治派别的“分类尝试”。

《剖析与批评》一文按照我们传统的政治思想的习惯，非常自然地、非常“熟能生巧”地将青年学生分成三个政治派别：“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严重派”和“中间模糊派”。依此类推，在当今大力强调加快改革、深化改革时，又要将青年学生分成“坚决改革派”、“反对改革派”和“中间模糊派”。请问：将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在对青年学生的政治派别的分类上，对实际的思想教育究竟会起什么作用？为什么在我们的队伍中居然还有那样多的人仍然死死抱住这种无益于人的发展的旧模式去做思想政治工作？难道我们还没有吃够按照主观意志轻易地将人们分成“左、中、右”这种做法的苦头吗？

《剖析与批评》一文的思想是如此之陈旧，就难怪它只能使用那些过去年代经常用的战斗性词句来“作战”了。

但是，这样做有说服力吗？这样做就表明真理在你的手中了？

从《剖析与批评》一文行文的反面启示中加强了我的这一观点：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确需要改革！而且的确需要深化改革！

为此，笔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提出以下几点想法：

第一，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适合于生产力低度发展水平的話，那么，当我们的社会从温饱型社会向小康型社会发展时，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就要多考虑“转型期”中的人的主体的需要和特征，就要对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来一个较大的改革。

第二，当我们的社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密切配合这个中心，也就是说，要使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发展”牢牢结合起来。如果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能使人全面发展，充分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了人的潜能，那么，生产力就有可能快速发展。在这一方面，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其工作的重点是如何将人们“管起来”。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人们的积极性和潜能是无论如何不能得到充分发展的。

第三，鉴于80年代对青少年发展的投入不够重视的倾向，因而要足够地吸取80年代的经验教训，即要在国力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对青年发展的“物质投入”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做得扎实，变得更为有效。

第四，如果说在80年代中的某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无奈、无力、无法的情况下进行“围”、“堵”、“压”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我们就再也不能使用这种“劝阻”的方式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了，更不能随随便便将青年学生分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严重派”和“中间模糊派”。因为我确实有点担心，在我们社会中坚持象《剖析与批评》一文所持观点的人还是不少的。当我看到《剖析与批评》一文中的“……这样派别不但过去有，今天和将来也仍然会出现”，“在阶级社会和阶级斗争中，不出现这种政治派别现象反而怪事了”等词句时，我就想到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的确是要求下大力气的，而且的确是应该摆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六

《剖析与批评》对《背景》进行了严厉的大批判，也挑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但是，《剖析与批评》与《背景》之间的“争论”究竟说明了什么？

第一，这场“争论”，已经改变了《背景》一文原来想探讨解决中国青年问题的旨意，经过《剖析与批评》一文作者的“努力”，竟然将它变成了一场“姓社”与“姓资”的争论。《背景》一文，本来是一篇学术研究的文章，然而经过《剖析与批评》的“加工”，竟成了一篇需要我们提高“阶级警惕性”、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文章。我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内，的确有一个“姓社”与“姓资”的问题，但是，是不是所有研究的课题都有一个“姓社”与“姓资”的问题呢？是不是将原来不属于“姓社”与“姓资”的问题，主观地变成“姓社”与“姓资”的问题，就视作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或“党性强”的标志呢？由此联想到：在社会科学的领域内，也同样有一个“反左”和“防左”的问题。《剖析与批评》一文正是这种“左”的思维的一种分析结果。

第二，“只破不立”是“文革遗风”之一。“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多的大批判文章，都是以“破”为绝对的目的。结果呢？中国优良的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的精神等，反被搞得面目全非（这与批判地继承及在革命中创新不同）。《剖析与批评》一文自己为解决中国青年问题作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而是以“破”字当头，胡乱地上纲。如果我们的社会科学都奉行这种哲学，社会科学如何繁荣？我们又怎样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第三，过去，我们的社会发生很多次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大都是针对社会科学的，因此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研究社会科学时总有危险之感，总是那样地小心翼翼，深恐犯错误。尤其是研究社会问题的学者更是在胆战心惊地研究问题，唯恐触犯了什么。我们的社会环境对社会科学为什么不能宽容一点呢？尽管我们经常宣布“允许探索、允许犯错误”。然而，一到时候，就动起“真格”的了。《背景》一文当然不是十全十美的文章，甚至《剖析与批评》一文也承认：“作者没有说明要搞资本主义制度，也没有说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类的东西”，但是左一个分析，右一个分析，《背景》一文很快地被打入这一范畴中去了。

《背景》一文的作者是一个很年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深知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帽子的分量，《剖析与批评》的确是在拿人们的政治生命开玩笑啊！我想，既然自然科学家经常在实验室中犯错误，那么，对社会科学家为什么不能有一个较宽宏大量的研究文化氛围呢？！

第四，社会科学的确需要一批批评家和评论家。但是，作为批评家和评论家的基本条件是：要对批评和评论的对象、内容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批评家和评论家也是“医生”，治病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从整个《剖析与批评》一文的行文来看，作者们对中国的青年问题至少是研究得不深不透，因而产生了这样奇怪的现象：对《背景》的作者可以断章取义、无限上纲，而一涉及到与产生青年问题的社会原因时，却尽说些某些人愿意听、喜欢听的“好话”。《剖析与批评》一文如此“爱憎截然分明”的态度到底是为了什么啊？

责任编辑：张宛丽

编后附记：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1986年本刊《发刊词》已明确宣言：“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展社会学的理论、历史、方法和应用等各方面的研究，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以服务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事业，这就是本刊的根本宗旨。”从此以后，本刊大力提倡、积极开展了学术争鸣。

这也就是本刊在1990年第5期发表陆建华《青年问题的制度背景——80年代中国青年问题研究之一》的所谓“背景”。接着我们又在1991年第2期再次发表《编者语：欢迎大家来争鸣》，列举了发表在本刊上有歧议的一些文章和争鸣的热点，其中就有陆建华同志的上文。编者语并指出，发表这篇文章，“我们也正是意在引起讨论，求得正确认识，使青年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过程中得到更好的解决，以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我们希望通过健康的学术争鸣，把这些讨论引向深入，能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有所裨益。因此，本刊特为广大作者和读者的争鸣提供园地，欢迎大家踊跃参加。”编者语还指出：“对待争鸣的态度，我们没有别的要求，还是四个字：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地对待所论的对象，实事求是地对待别人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之所在，舍此是达不到追求真理的目的的。争鸣的态度和风格本身就是学术水平和思想境界的体现——对学术尤其如此。我们愿与中国社会学界同仁在争鸣中培植中国社会学的优良学风而共同努力奋斗。”

感谢社会学界的同仁们的支持和响应，在我们这块小小的学术园地上果然出现了编者和读者都翘首期盼的争鸣曲。其中韩明谟与陈树德二位围绕中国社会学史的时限、分期及传统等问题进行的商榷，已有几个回合，引起了社会学界同仁们的广泛关注和兴趣。言辞间虽彼此不无少许讥诮，但究竟不失学者的风范，不仅使读者在争鸣中得到学术上的收益，也为在社会学界开健康文明的学术争鸣的风气带了个好头。所以本刊在今年第2期的编者按中再加提倡。

关于陆建华同志的这篇文章在本刊刊出后，我们最先看到的见诸文字的反应为《社会学与社会调查》(北京市社会学学会主办)1991年第2期上发表的厉评所写的《社会学研究述评》。《述评》写道：

在青年研究方面，陆建华的《青年问题的制度背景——80年代中国青年问题研究之一》(《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5期)则是近年来此类研究中难得一见的力作。在我国，青年研究是社会学中起步较早而且力量较为集中的领域。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国的青年研究，特别是在青年社会问题研究和对青年队伍状况的调查方面，都有可观的进展。但如同其他一些领域中的情形一样，理论研究明显滞后，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实证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深入。《青年问题的制度背景》一文则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该文指出，“青年问题存在本身就体现了对既存社会制度的疑问和挑战；而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取决于它能否有效地回答疑问、接受挑

战,能否消解青年问题的消极后果,使青年的合理社会行为得以顺利进行并获得全面的制度化保证”。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了青年问题与社会制度之间的三种不同类型的关系,即典型的制度问题、隐性制度问题和反制度性问题。对于我国80年代的青年问题,作者指出:“80年代青年的许多行为以及青年问题都具有系统的、强有力的制度背景”。首先,青年问题的出现是与旧体制的弊端联系在一起的;其次,制度改革目标、措施、实际社会后果之间的严重脱节对青年问题起了激化作用;再次,制度改革的曲折则使青年问题呈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质。

而在厉评之《述评》以后一年,却在1992年第1期《高校理论战线》上刊出了一篇与陆建华同志的文章和厉评的肯定性《述评》绝然相反的否定性批评文章。这就是署名宋秦年和肖思的文章《对〈青年问题的制度背景〉一文的剖析与批评》。该文判定:

……《青年问题的制度背景》是一篇值得研究的有严重错误的文章。

……只能看出这篇文章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很难寻找到肯定态度的迹象。

这篇文章出来之初,我们并不知晓,只是在本刊收到了邵道生同志对这篇《剖析与批评》之“反批评”的文章之后,我们方才拜读的。这篇文章这里不再重抄,其主要的不同观点上面邵道生同志的反批评文章已列了不少,若要看全文,刚出的刊物也极易找到。如果这些同志和其他同志还有新的不同的见解,愿在本刊发表,我们一定提供篇幅。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真理不怕驳,怕驳的非真理也。我们相信,真理会愈辩愈明。当然,辩论的目的既然是为了追求真理,就要有一个科学的民主的态度。因此,为提高我们的争鸣的水平,也为了尊重读者,我们对于批评家们也还想重复一点希望——这希望,还是鲁迅在七十年前《对于批评家的希望》中提出来的,所以这里只是重复:“我不敢望他们于解剖裁判别人的作品之前,先将自己的精神来解剖裁判一回,看本身有无浅薄卑劣荒谬之处,因为这事情是颇不容易的。我所希望的不过愿其有一点常识,例如知道裸体画和春画的差别,接吻和性交的差别,尸体解剖和戮尸的差别,出洋留学和‘放诸回夷’的差别,笋和竹的差别,猫和老虎的差别,老虎和番菜馆的差别……。”^①

在实事求是和常识的基础上,我们还特别希望,批评要注意政治,要进一步提高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史和党的历史上既有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但历史上也深受过大兴文字狱,深文周纳,罗织罪名,残害知识分子、搞文化专制主义之灾。党的历史上也有过乱抓辫子、乱戴帽子、乱打棍子、乱上纲之害。我们应该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否则,无学术争鸣可言,无学术自由可言,无科学文化的繁荣可言,无社会改革与发展可言,无社会主义民主可言。

^① 《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01—402页。